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文明的衝突或衝突而文明？評韓廷頓“文明衝突論”

Clash Civilizations or Civilization after Clashes: On Huntingtons "Clash of Civilizations"

doi:10.30390/ISC.199705_36(5).0005

問題與研究, 36(5), 1997

Issues & Studies, 36(5), 1997

作者/Author：吳釗燮(Jaushieh-Joseph Wu)

頁數/Page：67-75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7/05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705_36\(5\).0005](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705_36(5).0005)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文明的衝突或衝突而文明？

評韓廷頓「文明衝突論」

吳 釗 燮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第一所副研究員)

摘 要

國際知名政治學者韓廷頓於一九九三年發表「文明衝突論」一文，一九九六年更出版新書《文明衝突與塑造世界新秩序》一書，引起廣泛討論，成爲一九九〇年代政治學界最具衝擊性的學說。本文擬將討論韓氏文明衝突理論所包含的各項要點，並以之作爲其他國家面臨這種理論之應對處理方式。

關鍵詞：文明、文明圈、回教基本教義、主權國家、中東

* * *

壹、前 言

美國哈佛大學國際知名政治學者韓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在一九九三年外交事務季刊 (*Foreign Affairs*) 之上發表了極具震撼性的「文明衝突論」(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一文，^①引起了全球社會科學界的熱烈討論。之後的外交事務季刊之上，連續刊出多位其他學者的回響與批判。^②由於政治學界反應熱烈，

註① Sameu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3 (Summer 1993), pp. 22~49.

註② See, for example, Fouad Ajami, "The Summoning: But They Said, We Will Not Hearken,"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4 (September/October 1993), pp. 2~9; Kishore Mahbubani, "The Dangers of Decadence: What the Rest Can Teach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4 (September/October 1993), pp. 10~14; Rober L. Bartley, "The Case for Optimism: The West Should Believe in Itself,"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4 (September/October 1993), pp. 15~18; Liu Binyan, "Civilization Crafting: No Culture is an Island,"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4 (September/October 1993), pp. 19~21; Jeane J. Kirkpatrick and others, "The Modernization Imperative: Tradition and Change,"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4 (September/October 1993), pp. 22~26.

有些甚至可以說是強烈反感，因此韓廷頓又在一九九六年發表後續性的專文「西方：獨特性，非全面性」(The West: Unique, not Universal)，^③對其「文明衝突論」作一番補充說明，並作為其新書文明衝突與塑造世界新秩序(*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Making of World Order*)的楔子，^④且在此新書之中對其先前的論點加以深入闡述。到底文明衝突的內涵為何，其觀念是否符合當代人類的理性經驗，對於快速政治發展中的我國或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是否有值得參考借鏡之處，將是本文討論的重點。

貳、文明衝突理論要點

韓氏在其文明衝突理論中指出，當今國際政治學界有兩個主要的指導理論(Paradigm)，為以國家權力為中心的權力理論(Realism)和以經濟互動為主的整合理論(Integration Theory)。雖然以國家為基本單位的分歧化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趨勢，但國家主權在當今國際政治之中，是一個漸漸淡化的概念，而且這個理論也不斷受到批判。而以區域或全球性經濟整合的融合化雖也是一個趨勢，但卻無法解釋分歧化的現象。因此，國際政治學有必要找尋一個新的而且比較繁複的理論，對於國際政治上的各種趨勢能夠有一個比較完整的解釋與分析。^⑤而韓氏以當代國際政治上幾個重要的趨勢作為主要參考指標之後，認為文明圈之間與文明圈之內的彼此互動，是當代國際政治上的主要現象，因此以文明互動規則為主體的理論，便是一個能讓我們解釋並預測國際政治現象的理論，而且這個理論道理足夠簡單，卻能解釋繁複的國際政治現象，所以應該可以取代當今國際政治學界的其他指導理論。^⑥

基於文明理論，韓氏大膽預言，下一次的世界大戰，將是文明與文明之間，尤其是西方文明與其他文明圈之間的全面衝突。^⑦在西發里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之後的一個半世紀之間，西方世界的戰爭是屬於國王與君主之間為了領土與利益而引發的衝突。到了十八世紀開始民族國家建立之後，戰爭成為民族國家與民族國家之間的鬥爭。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國際戰爭成為意識形態之間的衝突，這些主要的意識形態包括納粹主義、共產主義與民主主義。然而這些主要的國際衝突是存在於西方世界，而且在當代也沒有了君王，國家主權觀念淡化，在納粹主義與共產主義相繼走入歷史，冷戰結束之後，國際衝突將走向一個全新的模式。^⑧韓氏更進一步分

註③ Sameul P. Huntington, "The West: Unique, Not Universal," *Foreign Affairs*, Vol. 75, No. 6 (November/December, 1996), pp. 28~46.

註④ Sameu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註⑤ Sameu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p. 36.

註⑥ *Ibid.*, pp. 37~39.

註⑦ Sameu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pp. 22~23.

註⑧ *Ibid.*, p. 23.

析指出，在後冷戰時期的衝突，大多數集中在文明與文明的交錯線（fault line）上，尤其是回教世界的邊緣地帶，如巴爾幹半島、車臣、中亞、北非、中東等地，而這些小型的衝突，是導因於文明與文明之間的不相容性，而卻因歷史因素被銜接在一起。由於文明意識的逐漸抬頭，這些交錯線上的衝突也足以引爆未來文明與文明之間的全局戰爭。^⑨

此外，韓氏強調西方文明具有其特質性（unique），西方文明之中的一些主要價值，如自由、民主、人權等，是西方文明本身在發展孕育的過程之中漸漸被共同接受的。但是西方文明之中被奉為最高真理的這一些價值，並不是全面性的與其他文明共同享有，更不是其他文明圈所必須接受的價值。因此，西方國家向其他文明圈的國家提出要求，遵守西方國家的人權與民主的標準，當然會引發許多爭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有許多地區許多國家快速現代化（Modernization），有些著名領袖甚至要使其國家成為全面西化（Westernization）。然而這些國家的現代化多數以物質的標準來衡量，但其內在更深一層的價值，卻將西方文明加以轉化，成為其本土文明的一部分，而非真正的西化。換言之，這些國家快速現代化，但並不盡然西化。以中國文明為例，她比西方文明有更悠久的歷史，也孕育出本身的一些價值觀，對於西方國家近乎沙文主義式的推銷自由與人權的價值，當然會表現出強烈的抗拒。中共與新加坡，一向都很驕傲的向西方世界宣布，他們本身有來自儒家學說淵遠流長的價值觀，不需要西方世界告訴他們應該如何做，這證明文明之間的差異性與不相容性，也證明西方文明所引以為真理的價值，並非全面性的價值。^⑩

韓氏的理論以西方文明為中心出發，在衡量各文明圈之經濟力、政治力、軍力等條件的變化之後，認為西方文明正在衰微之中，未來更會受到其他文明勢力的挑戰。而環顧全球，在最近的未來有能力與潛力對西方構成威脅的，就有回教的勢力與中國文明圈。回教文明圈在兩次石油危機之後其國際影響力大增，而且回教意識大幅提高。在一九九〇年波斯灣爆發危機並導致戰爭時，雖然大多數阿拉伯國家支持美國對伊拉克用兵，但是同時可以發現的一個重要趨勢，是在阿拉伯國家的民間社會興起了一股強烈的反西方回教基本教義浪潮，這個浪潮鞏固了回教文明圈本身的意識與向心力。而以中國大陸為主的中國文明圈，則因為蘇聯解體與本身所擁有的經濟與軍事條件，有潛在能力團結鄰近以儒教為主的國家，成為與西方勢力相抗衡的一個文明圈。而西方文明圈在面臨兩大文明圈勢力挑戰的應對方法，除了要保存本身的文明特質不使衰微，避免介入其他文明之間的衝突之外，還要不斷提升本身的軍事經濟力量，防止其他文明圈的主要國家軍事力量更加壯大。^⑪

從韓氏所引用的眾多例證而言，「文明衝突論」確實對於當今與未來國際政治的

註⑨ Sameu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pp. 266~298.

註⑩ Sameul P. Huntington, "The West: Unique, Not Universal."

註⑪ Sameu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pp. 301~321.

走向洞燭先機，也有許多值得我們警惕之處，對於國際政治學來說更是一個相當新穎的理論。然而這個理論本身，以及在引用例證時的許多觀點，卻有不少可議之處，分述如下。

叁、文明衝突理論之缺失

純粹從理論上來探討，確實，以主權國家之權力為主體的現實理論，在一九八〇年代之後受到很大挑戰。在國與國之間交往溝通因科技進步而頻率大增的今日世界，以合作為主體的國際體系理論，受到了普遍的重視，主權國家的觀念也因此逐漸淡化。^②但在這同時，主權國家的觀念淡化，除了西歐有漸漸成爲一個邦聯、北美國家成爲一個經濟聯盟的緩慢趨勢之外，並未帶來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進一步融合。相反的，由於冷戰的結束，來自兩強的約束力降低，地區性以國家爲單位的衝突不斷發生。更有甚者，冷戰結束使得一些主要國家頓時喪失長久以來所面對的强大敵人，其國家的外交政策也顯得有些不知所措，或許在其潛意識中會找尋一個替代敵人，以作爲其外交政策的長程目標。在這個尋求新敵人的過程之中，各種可能的衝突方式與潛在聯盟者都會被加以考慮，而文明與文明之間所存有的潛在相互衝突因子，就成爲這些主要國家必須面對的長遠問題之一。這顯然是韓氏提出文明衝突論的主要國際政治背景。

然而主權國家觀念的淡化，是否就意味著國家間的衝突將被文明圈之間的衝突所取代，卻是一個具有高度爭議性的論點。韓氏在其書中明白指出，人們之間相互認同有許多種層次，小自家庭學校，大至國家民族，而文明圈就是一種最高的認同層次。^③但是無可避免的，認同的層次越基本，認同強度會越高，而認同層次越廣泛，其強度也將會相對降低，因此以最高層次的文明認同作爲全球性衝突的基本原則，也同時相對喪失了其論點的分析力與說服力。

在十八世紀主權國家觀念受到西方接受，並在廿世紀漸漸擴散至全球各地之後，主權國家的觀念雖在近年有所淡化，卻仍然牢不可破。在冷戰結束之後，前蘇聯一個最驚人的現象，就是原先被迫加入聯邦的大小小共和國，都急於建立自己的國家，甚至不惜與俄羅斯開戰。在前南斯拉夫統治之下的幾個邦，也在共黨垮台之後立即分裂成獨立國家。另外，以回教文明圈來看，雖然阿拉伯國家之間有共同的歷史、文化、信仰、語言，倘若任何文明圈內部會有融合運動的話，回教文明圈應該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指標。但是當代的阿拉伯世界，即使有超越國界的回教基本教義風潮，各個國家人民對本身認同仍然相當強烈，一九六〇年代蔚爲風潮的泛阿拉伯主義，並無法在一九九〇年代成爲領導阿拉伯世界的主流思想。顯然，國家主權觀念的淡化，並未在

註② 詳見吳劍燮，*中東的戰爭與和平：衝突降低與爭端解決*（台北：志一出版社，民國八十五年），頁六～七。

註③ Sameu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p. 43.

當代演進至文明認同的層次；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文明認同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國家認同，成為國際社會一種最普遍的認同概念。

在文明與文明互相接觸之時，難免會因為文明內涵的不相容性與缺乏相互瞭解，而產生許多彼此之間的不良適應與相互衝突。如中東地區為三大一神教的發源地，卻也因為宗教的因素而爭戰不斷，甚至將信仰其他宗教者視為野蠻民族或異端，認為將其他宗教徹底打敗是其宗教應秉持的神聖戰爭。中國在清朝之時，飽嘗西洋船堅砲利之苦，一些有志之士思考應對之策，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念，以圖保存儒教思想的傳統文化，僅借用西方科技產物來壯大中國。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新加坡，也經常被包括韓氏本身在內的政治學者所討論。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聯邦獨立建國後，在前總理李光耀先生的領導之下，創造了經濟社會發展令人驚羨的成就。但是在李光耀先生的主政期間，甚至在他退隱幕後之後，新加坡卻一直堅持一個信念：西方的民主與人權價值觀並不適用於隸屬東方文明的新加坡。在這個信念主導之下，新加坡排斥西方國家加諸其身的民主與人權方面之批判。相同的，建設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是剛去世的鄧小平最被世人記憶傳頌的理念。同樣的情形發生在具有相當保守傳統的回教世界，尤其是因石油而致富的阿拉伯國家，這些國家的執政者只希望利用其財富創造生活上的更大便利與享受，卻同時視西方國家的典章制度與生活習慣為洪水猛獸，仍然堅持先知默罕德所創立的回教律法與傳統。還有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是於一九五〇與一九六〇年代在西方國家扶持之下建立民主政體，但是這些新建立的民主國家卻一個接一個被提倡本土文明的在地勢力所推翻。從這些表象來看，文明與文明之間似乎存在著相當高度的不相容性，也因為這些不相容性，文明與文明之間就潛藏著衝突的因子。

但是以上所說的這些情況，並沒有任何明顯的跡象，可以讓我們發現文明與文明之間將會發生大規模衝突，更不用談世界大戰的爆發了。韓氏在「文明衝突論」一文和《文明衝突與塑造世界新秩序》一書之中，不斷援引位於文明交界點的國家間衝突，作為文明衝突的例證，如前南斯拉夫境內的波斯尼亞與塞爾維亞之間和黎巴嫩不同宗教派系之間的不斷爭戰。^⑩確實，前南斯拉夫以及黎巴嫩正好位於基督教、羅馬天主教、東正教與回教幾大文明的交界點，黎巴嫩自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九一年的派系酣鬥，是人類的一場悲劇；而在前南斯拉夫，當宗教爭執與種族問題相重疊時，便演成一場你死我活、難以制止的戰爭。在俄羅斯提供武器給同屬東正教的塞爾維亞時，沙烏地阿拉伯等國也對同屬回教的波斯尼亞提供大量援助，雖然美國與西歐國家在民意驅策之下，被迫介入波斯尼亞的戰爭，但是在制止同屬西方文明的塞爾維亞人暴行時，卻顯得有氣無力，在韓氏看來，這兩個地區也是文明衝突的例證。

然而在深入瞭解這兩個地區的複雜性之後，我們或許可以獲得與韓氏極為不同的結論。以黎巴嫩內戰來說，一九七五年戰爭爆發的遠因，是法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

註⑩ Sameu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Chapter 10.

刻意製造一個基督教馬龍派（Maronite）人口較多的獨立國家，設計一套非常脆弱但卻能讓馬龍派主導國內政治經濟的教派協商體制（Confessionalism），以維持法國的宗主地位，而沒有考慮整個大敘利亞地區人民的意願與利益。而其近因，是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zation）在一九七〇年被約旦驅逐而移入黎國之後，造成黎國內部權力的失衡與緊張，在以色列砲火不斷攻擊之下，各宗教派系與傳統領袖之間爲了如何處理以、巴之間的糾紛，而造成彼此敵意持續升高。鄰近的以色列與敘利亞蓄意介入之下，更使得內戰一發不可收拾。^⑤黎巴嫩內戰，簡單來說，是各派系領袖之間的爭權奪利，與其他主權國家之間以黎巴嫩爲沙場相互競逐而起，宗教並非衝突的主因，更談不上文明與文明之間的對抗。在目前敘利亞已經有效控制黎巴嫩的局面之後，也難以看出黎巴嫩的內爭在未來將會引發一場世界性的大戰。

前南斯拉夫同樣位於幾大宗教文明的十字路口，宗教種族之複雜性絕不亞於中東的黎巴嫩。在前蘇聯所支持的專制政體統治之下，所有可能引發爭執與衝突的因素全遭到壓抑，但是當南斯拉夫崩解，政治上的箝制力量喪失之後，所有二次大戰之後遭到壓抑的宗教、種族、領土的仇恨與糾紛，便完全引爆開來，而且因爲缺乏強勢外力的介入，使得屠殺與報復的惡性循環難以終止。^⑥然而究其原因，卻與黎巴嫩內戰極爲相似，是帝國主義強盛時期相互侵奪的後遺症，宗教只是一個團結團體組織或國家的重要手段。宗教並不導致殺戮，文明亦不造成戰爭；戰爭與殺戮，是一些權力醞釀的政客蓄意挑起民族、國家、宗教之間的仇恨所造成的。宗教確實是一個讓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等回教國家支援波斯尼亞的動力來源，但是原本存在於衆多阿拉伯國家之內的，卻是一些大城市之中清真寺與天主教堂隔街對望、和平相處的事實，而這事實正告訴人們：宗教並不是戰爭的原因。

至於西方自由、民主與人權價值不能強加於其他文明圈，更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說法，甚至與韓氏本身的自由民主信念背道而馳。印度、台灣、日本等國雖分屬不同的文明圈，但這些國家民主化的成就，證明這種說法只不過是一些國家持續其專制獨裁統治的藉口。五〇年代與六〇年代一些美國所扶植的第三世界民主國家遭到本土勢力的推翻，並不能證明第三世界本土文明的抬頭，與西方文明相抗衡，因爲當時美國所扶植的所謂「民主國家」，多數並非真正實行民主政治，甚至許多「民主國家」的政權以迫害人民著稱，他們被美國稱之爲民主國家，只不過是因爲他們在冷戰年代與西方國家結盟，對抗共產集團而已。以伊朗一九七九年的什葉派回教革命爲例，巴勒維國王的殘暴性格，加上處理快速現代化所帶來的紊亂局面時的無能爲力，引起各方勢力對政府的反抗。伊朗政權最終爲回教基本教義勢力所奪得，只不過說明傳統宗教是廣大伊朗社會的一個最主要團結力量，也顯示巴勒維在一九六〇年代與一九七〇年

註⑤ 詳見吳劍燮，「黎巴嫩政局展望」，問題與研究，第三十二卷第二期，民國八十二年二月，頁三四～四五。

註⑥ 詳見洪茂雄，「南斯拉夫之分裂和未來動向」，問題與研究，第三十一卷第一期，民國八十一年一月，頁一～十三。

代的現代化過程之中，並未努力創造一個市民文化與健全的政府體制，而僅僅沉耽於石油財富與本身權位的維持，成爲一個極端腐敗而又殘暴的政權，而使得回教勢力成爲最終勝利者，也是有能力維持政治社會穩定的唯一力量。^①伊朗回教政權對西方強烈敵視的態度，顯然是在延續一般人民對於前政權的仇恨，並且藉以轉移一般人民對於政權的可能不滿，這和許多專制極權國家的作法並沒有本質上的不同。

沙烏地阿拉伯也是經常被援引，作爲回教統治根深蒂固，且西方民主體制難以被接受的例證。同樣的，韓氏也認爲這些國家對西方價值的排斥，是因爲與本身文明價值的不相容，甚至以沙國與伊朗援助波斯尼亞的事實，當作回教文明對抗西方文明的前哨戰。然而沙烏地阿拉伯皇室積極推行回教戒律的主要原因，固然一部分來自對伊斯蘭的信仰，但更重要的因素卻是爲了維持皇室統治的穩定；藉宗教的神聖力量來維持其特權於不墜，是一個何等廉價而又有效的工具。然而韓氏在探討這些現象時，是秉持西歐北美文明圈的觀點，在沒有詳細探究本土勢力本身的動態時，當然會感受到西方文明價值所受到世界其他地區本土價值的強力挑戰。

確實，各大文明的傳統價值中有些許多不盡相容的理念，而且這些不相容的理念自個人本身、家庭、團體機構，而至社會國家，都會因爲溝通接觸而有一番衝突與掙扎。然而除非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團體機構或一個社會國家能夠遺世而獨立，否則掙扎、排斥、調適、學習、融合、內化的過程，將會持續不斷的進行，使得一個文明的內涵不斷改變。一個文明之所以能夠維持甚至壯大，並不是因爲本身所蘊含的理念，有讓其維繫於不墜的能力，而是在與其他文明接觸之時，能夠多所採擷、補充與融合。在相互學習與模仿的經驗中，我們可以發現許多可引以爲自豪的傳統理念，卻不是只有我們所有，而是與其他文明圈所共有，甚或是其他文明圈所努力學習的對象。在這個世界上，我們是可以看到文明與文明之間因爲接觸而有所衝突，但是因爲衝突，也使得一個既有的文明不斷更新發展。換言之，衝突矛盾並非文明與文明之間接觸的必然結果，而是不斷改變的過程中的一個現象，而且是使得一個既有文明更加發展的必經過程。韓氏本身也不否認，在一個文明認爲其爲最終的或最高的理想時，就是這個文明衰微沒落的開始。^②因此居處於西方文明圈之外的我們，在看到西方文明有恐於衰微沒落而積極振作之時，更有必要向外學習接納新的價值，而非一味排斥。

西方將其文明中的自由、民主與人權的價值強加於其他國家，在道德考量上確有沙文主義之嫌，在西方國家的實際運作中也確有許多不妥之處。然而在比較各種政治制度所宣揚及其本身所蘊含的理念之後，自由、民主與人權卻是當代國際社會受到大多數人支持與追求的目標。韓氏在許多公開的場合盛情讚譽我國民主轉型的偉大成

註① James A. Bill and Robert Springborg,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3rd edition (U.S. :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1990), p. 376; 在該書作者眼中，壓制與貪污是巴勒維政權的兩個主要特徵。另參見 Geroge Lenczowski, *The Middle East in World Affairs*, 4th edition (Ithaca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222~227.

註② Sameu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pp. 301~308.

就，也多次公開強烈批判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更明白表示對中共迫害人權與專制統治的無法容忍。^①這前後的對照，也顯得韓氏論點存在相當嚴重的矛盾性格。

韓氏明確表示其論點是從西方世界出發，表現為對西方世界維持全球優勢的期待。^②因為這個期待，韓氏在環顧全球局勢之後，認為只有回教世界與中國對西方世界具有挑戰的能力，也因此特別擔心這兩個文明圈的强大與團結，充滿對回教世界的敵視與對中共的疑懼。但是任何對中東有深入研究的學者，應該很難想像整個回教世界，或阿拉伯國家，會團結在宗教之下成為一股强大的全球性力量。一九九〇年代在阿拉伯世界所興起的回教基本教義風潮，與波斯灣戰爭有明顯的關聯性，這是無可置疑的。波斯灣戰爭是由美國領導世界各地的力量，包括多數的阿拉伯國家領導人，共同打敗伊拉克，在這國際政治的層面上，多數阿拉伯國家與西方國家是站在同一陣線。但這同時，許多阿拉伯人民卻風起反抗西方國家在中東地區大動干戈，批判西方的物質主義，甚至抗議其國家領導人加入西方行列，對付同為阿拉伯人的伊拉克。如果我們深一層分析隱藏在反西方主義背後的因素，是這些回教國家的人民對於其腐敗無能或專制殘暴的統治者，實際上除了訴諸宗教之外，並沒有團結一致反抗政府的著力點。這些回教的基本教義分子是否真的完全否定西方的文明與政治價值，其實是有相當大的爭議性。東起約旦，西至阿爾及利亞，以回教基本教義派分子大舉投入全國大選的情況來看，顯然他們對民主政治並不完全排斥。

回教基本教義派的興起，是否會形成阿拉伯世界的大團結，成為一個敵視西方的集團性龐大力量，是韓氏所擔憂之處。雖然泛阿拉伯主義一度在阿拉伯世界成為風潮，但在歷經抑鬱而終的埃及納瑟之後，已經沒有任何中東學者會誤認泛阿拉伯主義將會有成功的機會。一九六〇年代之後團結阿拉伯國家的巴勒斯坦迷思，也因為波斯灣戰爭與巴勒斯坦自治的展開，而告破滅。而在另一方面，在回教世界的基本教義風潮，並沒有受到普遍的認同，甚至受到多數世俗化民衆的敵視，在多數希望現代化的阿拉伯國家之中，以回教基本教義分子主導政治發展的機會並不大。相反的，各個阿拉伯國家之間的各式各樣糾紛與爭執，仍將主導其在國際政治上的擺設，主權國家的觀念，在多數的區域或全球性問題上，已經強過對民族與文化的認同。

韓氏對中共威脅的看法，與多數國際政治學者沒有太大差異，中共在廿一世紀開始之後，可以預期將構成對西方世界最大的挑戰。尤其中共在一九八〇年代之後快速現代化，在前蘇聯帝國瓦解之後，中共與俄羅斯不斷改善關係，增強軍事方面的貿易，獲得先進的武器系統，成為亞洲地區令人驚懼的強權，也成為一個東亞地區不穩定的主要因素。^③但是中共對西方的挑戰，雙方的敵意升高，甚或在未來爆發戰爭，卻

註① Sameul P. Huntington, "Democracy for the Long Haul,"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solidating the Third Wave Democracies: Trends and Challenges, Taipei, August 27~30, 1995.

註② Sameu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pp. 301~318.

註③ See Bates Gill and Taeho Kim, *China's Arms Acquisitions from Abroad: A Quest for 'Superb and Secret Weap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很難解釋為基於東西文明之間的相互衝突。在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共團結內部一致對外的主要力量來源，絕不是中國文明對付西方文明，或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與生活方式的維持與提升的理念，而是中國人團結對外的民族主義；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與生活方式，已經遭到共產主義的無情摧殘，而民族主義在極權統治的激情帶動之下，也已經成爲一個無可取代的意識形態。民族認同在韓氏的定義中，並沒有文明認同層次來得廣泛，中國在地圖上所佔有的面積，也不等於中國文明圈，居處於中國文明圈的其他國家，更不一定同意中共與西方抗衡的作法，在一旦中共與西方國家爆發戰爭之時，也不一定與中共站在同一陣線；相反的，因爲這些國家對中共對外擴張的恐懼可能遠大過對中國文明圈的認同，所以在未來的中共與西方國家戰爭之中，成爲西方國家圍堵中共的盟友還可能多於和中共結盟對抗西方。若此，中國在未來與西方世界的對抗，也絕難說是一種文明認同之間的相互對抗。

以西方文明爲本位來分析其可能受到的挑戰，這本身就存在對其他文明的偏見，而若這種分析受到西方掌權者接受，其後果是在日漸緩和的國際趨勢之中，又在幾個國家集團之間畫上一道道鴻溝，或在地平線上建立起可怕的敵人，原來可以避免的許多衝突，現在又多了一層令人憂心的考慮因素，許多原本必須要被銷毀的大量殺傷力武器，現在又有了繼續製造的堂皇理由。

肆、結 論

在沒有明顯意識形態的現代世界，戰爭與衝突，仍將是國家與國家之間、民族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情緒的對立與利益的爭奪，語言、文化、宗教、種族等文明內涵，也仍將被專制獨裁的政治領袖利用來作爲其奪權、抗爭、挑起仇恨的工具。國家與國家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的仇恨，仍然來自對於對方的一無所知與溝通管道的欠缺。

人類所居住的世界，由於交通發達與傳播普及，已經變得越來越小，文明圈之間的互動也越來越頻繁。由於電腦科技與電子通訊的高度發展，我們更可以預見未來的世界，都將隸屬於一個整體的電子科技文明，舊有文明圈的疆界將越來越模糊，也越來越顯得無足輕重。雖然種族、宗教、部分傳統價值觀與其他根深蒂固的文明內涵並不會輕易變化，但是西方，將不再是特質性的，也將少有文明內涵不是全面性的。

冷戰之後的今日世界，提供人類一個契機，以建立一個以化解誤會、增進合作互信、集體安全爲基礎的國際新秩序。但是以文明對抗作爲塑造世界新秩序的基礎，卻以偏見、懷疑與敵視的眼光來看待其他的文明圈，這是一個重新包裝的國際現實主義，也將爲人類帶進另一個紀元的冷戰。

*

*

*

